

「耳順」之「耳」字義及非衍考辨

盧秀仁¹

摘要

《論語》一書於西漢武帝之時，即有《魯論》、《齊論》、《古論》三者并行於世。迨西漢末張禹以《魯論》篇章為本，刪削《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合成世稱之《張侯論》。其後東漢·鄭玄就《張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論語·為政篇》所云：「六十而耳順」，鄭玄即注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歷魏·何晏等輯八家注之《論語集解》及南朝梁·皇侃《義疏》，皆承其說。惟迄唐·韓愈別出心裁而稱「耳順」之「耳」為「爾」非「口耳」之「耳」，李翱附和其言。洎此而後，亦出現「耳順」之「耳」為「衍字」論、「語助『而已』」論，更有稱「耳」為「聃」之說者，真偽分爭，困擾學界，無以所適。然以中國現存尚保有《論語·為政篇》所云：「六十而耳順」之《論語集解》唐抄本，對照 1973 年出土於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之《論語》殘簡，確然可證「六十而耳順」之「耳」，於西漢三《論》并行之時，已同然存在，絕無「衍字」之虞；且考《說文解字》、《經傳釋詞》諸本，亦了然「耳順」之「耳」為「口耳」之「耳」，絕非「爾」、「聃」二字，更非語助「而已」之釋。

關鍵詞：〈為政〉、耳順、《論語》、經學

¹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通訊作者：盧秀仁，E-mail: ts168tw@gmail.com

壹、前言

《論語·為政》有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¹乃孔子年屆七十自衛返魯，所興之言，²咸為孔子一生治學修養之進道程序。歷來諸家於各段進程之解釋，皆無歧異，惟獨「六十而耳順」之「耳」，猶如戰國從衡，紛然殽亂，莫衷一是，著實令人費解。

現存文獻，最早注《論語》者，乃東漢·鄭玄（127-200）。其注「耳順」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³其後南朝梁·皇侃（488-545）承其意旨而疏：「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⁴北宋·邢昺（932-1010）則融合二者之言，稱：「耳聞其言，則知其微旨而不逆也。」⁵迄南宋·朱熹（1130-1200），調合以上諸說，謂之：「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⁶觀四者之注疏，咸將「耳」字視如「耳朵」，且歷代皆無疑異。

近世錢穆（1895—1990）猶遵鄭玄、皇侃、邢昺、朱熹之旨而稱：

外界一切相異相反之意見與言論，一切違逆不順之反應與刺激，既由能立不惑，又知天命而有以處之，不為所搖撼所迷惑，於是更進而有耳順之境界。⁷

錢氏循鄭、皇、邢、朱者之言，婉婉以釋：凡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之修為程序，即能不受外在相悖相異、違逆不順之言論、意見，所形成諸般之刺激、反應而搖撼與迷惑，若此則更可達到「耳順」之境界。是以錢穆謂之：「耳順者，一切聽入於耳，不復感其於我有不順，於道有不順。」⁸錢氏同釋「耳順」之「耳」為器官之「耳」。

1 三國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為政第二疏〉，《論語集解義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89·四書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95 冊，卷 1，頁 348。

2 按：唐·李翱曰：「蓋孔子興言時，已七十矣。是自衛反魯之時也。」參閱唐·韓愈，李翱撰：〈為政第二〉，《論語筆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90·四書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96 冊，卷上，頁 4。

3 三國魏·何晏等集解，明·葛鼎校訂：〈為政第二〉，《論語》（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 年據永懷堂本校刊），卷 2，葉 2。

4 三國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為政第二疏〉，《論語集解義疏》，卷 1，頁 349。

5 三國魏·何晏集解，唐·陸德明音義，北宋·邢昺疏：〈為政第二〉，《論語注疏》，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經部第 69 冊·論語類》（臺北：世界書局，1988 年），總第 70 冊，頁 17。

6 南宋·朱熹撰：〈為政第二〉，《論語集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91·四書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97 冊，頁 17。

7 錢穆著：〈為政篇第二〉，《論語新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頁 23。

8 同上註。

另有唐君毅(1909-1978)亦類錢穆脈絡，而謂：「孔子六十耳順，聲入心通，如孟子言大而化之之境。」⁹唐氏喻朱子「聲入心通」之義，猶如《孟子》所言：「大而化之之謂聖」¹⁰之聖人境界。「聲」者由「耳」入之於「心」，是謂「心通」，故唐氏訓「耳」猶然「耳朵」之「耳」。

今學者陸信禮於〈孔子自述章淺解之六十耳順〉一文，亦解「耳順」：「也就是『順耳』，不『逆耳』。」¹¹釋「耳」如同鄭玄一派，視為「耳朵」

然唐·韓愈(768-824)另訓「耳順」之「耳」，稱：「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¹²且唐·李翱(774-836)應和曰：「……刪修《禮》、《樂》、《詩》、《書》皆本天命而作如其順。」¹³二人解「耳」為「爾」，做「代詞」，訓之「如此」，「耳順」即「爾順」，猶「如此順天命」之意。日人伊東龜年(?)於所著《論語筆解考》中，即遵韓愈之說。¹⁴

近人于省吾(1896-1984)雖贊韓愈之見，惟不採韓愈之論，其謂：「按韓解雖非，其不從耳順之說，自具卓識。」同時否定鄭玄之言，斥之：「孔子豈待六十聞言，始知其微旨乎？」並謂之：

耳字乃衍文，然自漢時已如此，則其衍必在秦漢之際矣。或以下言「心」而上增「耳」字，或以「而」、「耳」聲韻相同，因之誤衍。¹⁵

于氏推翻鄭玄注「耳順」之「耳」為「聽聞其言」之「耳朵」，而以為「耳順」之「耳」乃衍生之字，且自秦漢之時即已。另推測其源，恐因下句「七十而從心所欲」，有言「心」字，是以上句增衍「耳」字，又或「而」、「耳」聲韻相同，故致衍生。其說亦獲程石泉(1909-2005)響應，謂之：「按此章文理，應無『耳』字。『耳』字必為後人所誤入。」¹⁶

程氏持論，除據于氏之說，更依陳鐵凡(1912-1992)《敦煌論語校讀記》引英人斯坦因(?)所持《敦煌論語集解》殘卷，編號 S.4696 所載：「六十如順」，

9 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年)，頁147。

10 東漢·趙岐注，北宋·孫奭疏：〈盡心章句下〉，《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第14上，頁464。

11 陸信禮：〈孔子自述章淺解之六十耳順〉，《中國海洋大學校報》(電子版)，第1748期(2012年4月12日)，第3版：觀點。(網址：http://ouceducnxaobao.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595664)

12 唐·韓愈，李翱撰：〈為政第二〉，《論語筆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90·四書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96冊，卷上，頁4。

13 同上註。

14 唐·韓愈著，日本·伊東龜年校正：《論語筆解考》，收入嚴靈峯編輯：《無求備齋論語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據日本明和八年嵩山房刊本影印)，第27函，264冊，卷上，葉3。

15 于省吾撰：《論語新證》，收入嚴靈峯編輯：《無求備齋論語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據排印本影印)，第26函，255冊，頁2。

16 程石泉著：《論語讀訓解故》(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組，1981年)，頁14。

非「六十而耳順」，且「如」、「而」通用之故，推測「唐抄本」並不據石經抄寫而另據民間通行本為之，¹⁷是以呼應「耳」乃「衍字」之稱。

今有傅佩榮者，合併韓愈、于省吾、程石泉三者之論，視「耳」為衍字，「六十而耳順」，當讀為「六十而順」，且此「順」乃「順天命」之謂。¹⁸

近人沈有鼎（1908-1989）不納韓愈「耳」即為「爾」之述，亦不採于、程「耳」乃「衍字」之說，另行變化而引申：

此句前人皆望文生義，不得其解。「耳」即「而已」，猶「諸」即「之乎」或「之於」。徐言之曰「而已」，急言之曰「耳」。此句或原作「六十耳順」，即「六十而已順」。後人不知「耳」即「而已」。見上下諸句中間皆有「而」字，於此亦加一「而」字，遂成為「而耳順」。後人解釋者，皆以耳為耳目之耳，於是此句遂費解。¹⁹

沈有鼎不類韓愈視「耳」為「爾」，且不若于省吾、程石泉，將「耳」視如「衍字」，而稱此「耳」於緩言時，謂之「而已」，倘急呼，則曰「耳」。並推估原文應作「六十耳順」，即「六十而已順」。

沈氏又稱後人不知「耳」即「而已」，因見上下諸句皆有「而」字居間，故於「六十耳順」亦加一「而」字，遂成「而耳順」。後人即由此，而以「耳目」之「耳」訓之，故形成費解。沈有鼎此說，猶間接否定鄭玄之注矣。

馮友蘭（1895-1990）全然接受沈有鼎之論，不僅分析其言，且詳為釋之：

「六十而耳順」，據近人的研究，「耳」字就是「而已」。「而」、「已」兩個字的連讀，念得快了，就成為「耳」。「六十而耳順」，就是六十而已順。順什麼呢？聯繫上文，順是順天命。²⁰

馮友蘭贊沈有鼎「而已」之言，且納韓愈「順天命」之謂，匯此二者，直訓為「六十而已順天命」。

今有周克庸者，則摘掇韓愈理則，另釋之：

「耳順」當為「聃順」。耳、聃音同（日母雙聲之部韻），「耳」是借字或誤字，其正字為「聃」。聃訓「和」，和訓「相應」，所以「耳順」之「耳」是動詞，義為「應和」，與耳朵毫無關涉。²¹

17 原文：「按陳鐵凡《敦煌論語校讀記》：《敦煌論語集解》殘卷 S.4696 作『六十如順』。陳君按：『此又如、而通用之一例。』（『如』『而』通用例，王引之《經傳釋詞》列舉甚多。）是則唐人抄本《論語》原無『耳』字。何以漢唐石經有『耳』字？想唐抄本不據石經而另據民間通行本。」程石泉著：《論語讀訓解故》（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組，1981 年），頁 14

18 詳參傅佩榮著：〈附錄三一「耳順」的商榷〉，《儒家哲學新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 年），頁 327-329。

19 轉引自馮友蘭著：《新原道》（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年），頁 14-15。

20 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上冊，頁 191。

21 周克庸：〈孔子「六十而耳順」新解〉，《晉陽學刊》，2001 年第 3 期，頁 102。

周氏以為「六十而耳順」之「耳」乃借字或誤字，其正字應為「聃」。訓「聃」為「和」且「和」釋「相應」，是以得證「耳順」之「耳」為動詞，義為「應和」，其與「耳朵」毫無干涉。

「六十而耳順」之「耳」，雖視簡單一字，惟洎韓愈以降，林林總總諸般之疏說，反顯其不類上、下他句諸字之平常，益發激使末學深入探究、解惑之決心，是以不揣淺陋，提出蠡測之文，期以就教方家，得獲指正。

貳、「耳順」之「耳」，非「爾」、亦非「而已」之說

清·顧炎武(1613-1682)曾言：

且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²²

顧氏明言，凡經學必有其源流，自漢以迄於宋，更迨於今，咸須一一考究，方知異同離合之旨。倘論古文，考究其字者，必本於《說文解字》以證。是以「耳」、「爾」、「聃」字，當以《說文》以釋其異同。

今考東漢·許慎(?)《說文》云：「尔，詞之必然也。」²³清·段玉裁(1735-1815)於《說文解字注》即云：「尔之言『如此』也。後世多以『爾』為之。」²⁴是以「尔」即通「爾」，此「爾」字做「詞之必然」即「如此」解釋。

段氏且於「爾」字之注曰：

以其與「汝」雙聲，假為爾，汝字。又凡訓「如此」、訓「此」者，皆當作「尔」，乃皆用「爾」，爾行而尔廢矣。²⁵

段玉裁明釋「爾」與「汝」字雙聲，故為「汝」字通假，且訓「如此」、「此」者，皆為「尔」義，後人皆以「爾」字代之，是以日後「爾」行而「尔」廢。

段氏亦強調：「語助有用『耳』者，與『爾』絕殊。」²⁶是以其訓「耳」時即曰：

22 清·顧炎武撰：〈與人書四〉，《亭林文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卷4，葉17。

23 東漢·許慎撰，北宋·徐鉉增釋：〈文三〉，《說文解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217·小學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23冊，卷2上，頁91。

24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第二篇上·文三〉，《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49。

25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第三篇下·文二〉，《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129。

26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第二篇上·文三〉，頁49。

凡語云「而已」者，急言之曰「耳」，在古音一部；凡云「如此」者，急言之曰「爾」，在古音十五部，如世說云：「聊復爾耳」，謂「且如此而已是也。」二字音、義絕不容相混。²⁷

段玉裁稱「耳」字有當語助詞使用，此語助之「耳」與「爾」字二者，絕對有所區別。凡語意為「而已」者，其急言時不稱「而已」，逕呼為「耳」，且處段氏所著〈古十七部諧聲表·六書音均表二〉之「第一部」²⁸；凡語意釋「如此」者，急言不謂「如此」，而直稱曰「爾」，位居「第十五部」²⁹。

段氏舉《晉書》：「聊復『爾』『耳』」³⁰譯之「且『如此』『而已』」之例，以分別「爾」之「如此」、「耳」即「而已」，前為「代詞」、後者「語助」，二字之義截然不同。

段氏更斥「唐人至今譌亂，至不可言，於古「經」、「傳」亦任意填寫，致多難讀。」³¹且舉《論語》數例以佐其言，曰：

即如《論語》一經，言「云爾」者，謂「如此」也；言「謹爾」、「率爾」、「鏗爾」者，「爾」猶「然」也；言「無隱乎爾」、「一日長乎爾」，「爾」猶「汝」也；言「汝得人焉爾乎」，言得人「於此」否也，《公羊傳》三年問「焉爾」，皆訓「於此」也。全經惟有「前言戲之耳」，乃「而已」之訓。今俗刻作「汝得人焉耳乎」，乃極為可笑。³²

段玉裁以《論語》全書所言「爾」字諸例，另輔《公羊傳》謂「爾」之類，其訓若非「如此」，即為「然」或「汝」或「於此」之意，咸無「而已」之釋。

段氏稱《論語》一書惟訓「而已」者，僅〈陽貨〉：「前言戲之耳」³³，其「耳」當「語助」，義非前述各「爾」代詞或助詞「然」之義，是以二者誠然不類，「相通」之情，未之有也。

若此段玉裁即譏俗人誤將「汝得人焉『爾』乎」，刻作「汝得人焉『耳』乎」，此「爾」絕非「耳」，惟世之訛傳，已由唐人起矣，是以段氏稱：「近人『爾』『耳』不分」³⁴，諷其「極為可笑」。

27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第十二篇上·文六十七·重六〉，《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597。

28 同上註，〈古十七部諧聲表·六書音均表二〉，頁827。

29 同上註，頁836。

30 參閱唐·太宗文皇帝撰：〈列傳第十九·阮籍〉，《晉書》（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光緒癸卯冬十月，五洲同文局據武英殿版石印），卷49，葉4。

31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第十二篇上·文六十七·重六〉，《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597。

32 同上註，頁597。

33 三國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陽貨第十七〉，《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66。

34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第二篇上·文三〉，《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頁49。

「爾」字亦有用於句末語助者，段玉裁未引實證，惟考清·王引之(1766-1834)援《禮記·檀弓下》：「不以食道，用美焉爾。」³⁵即訓：「爾，猶『而已』也。」³⁶雖釋此「爾」乃「而已」，然王氏亦同段氏，並無因此而訓「『爾』猶『耳』」或「『耳』通『爾』」也。³⁷

段玉裁已言：「語助有用『耳』者，與『爾』絕殊。」且稱：「凡語云『而已』者，急言之曰『耳』，在古音一部；凡云『如此』者，急言之曰『爾』，在古音十五部。」對照王引之《經傳釋詞》之述，即已了然語助之「耳」與語助之「爾」，同然釋之「而已」，惟各字古音全不同部，猶然不可等類以視。

況急言之「耳」當語助，用於句尾，訓之「而已」，惟「爾」之急言，解之「如此」，卻非語尾。今觀「六十而『耳』順」，其「耳」處，既非句尾，則無所謂語助之「耳」訓之「而已」之慮。

該「耳」所處，倘若為「爾」，則該「爾」者，所居非尾，則無能訓之「而已」，例屬急言，理將釋之「如此」或「此」或「然」或「汝」或「於此」，果若此般，則更無通「耳」之理，是以依段玉裁、王引之之論，此「耳」非「爾」已然明確，若此唐·韓愈、李翱所謂：「耳當為『爾』」³⁸之說，確然譌錯，所論顯然無理。

再者沈有鼎所言：「徐言之曰『而已』，急言之曰『耳』。此句或原作『六十耳順』，即『六十而已順』」³⁹之說，因「耳」之所處，依上之述，非「語助」之位，故不得訓之「而已」，其「六十而已順」之論，猶然無能成立。

況孔子稱此語時，乃推辭衛·孔文子且已自衛返魯之際，⁴⁰其心境為何，恐無可考，然據〈為政〉第四章全文以觀，孔子言時或處溫和之境，當無「急言」之情，沈氏據此以推，於理更不足道。

然馮友蘭全然承其意旨，併採韓愈「順天命」之說，而謂：

六十『而耳』順，就是六十「而已」順。順什麼呢？聯繫上文，順是順天命。⁴¹

馮氏循沈有鼎「急言」說，已然有錯，竟掇拾韓愈「順天命」之詞而謂「下文聯繫上文「五十知天命」之「天命」二字，即成「六十而已順天命」之語。

35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檀弓下第四〉，《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9，頁310。

36 清·王引之撰，民·黃侃、楊樹達批本：〈尔爾〉，《經傳釋詞》（長沙：岳麓書社，1982年），卷7，頁160。

37 同上註，頁160-163。

38 唐·韓愈，李翱撰：〈為政第二〉，《論語筆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90·四書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96冊，卷上，頁4。

39 轉引自馮友蘭著：《新原道》（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頁14。

40 按〈孔子世家〉言：「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參閱西漢·司馬遷撰：〈孔子世家第十七〉，《史記》（上海：中華書局，1963年），卷47，頁1934。

41 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上冊，頁191。

今藉李翱所云：「蓋孔子興言時，已七十矣；是自衛反魯之時也」⁴²之言反思，孔子五十六歲由大司寇行攝相事不久，即遭齊離間去魯，開始周遊列國，⁴³期間即如晨門所謂：「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⁴⁴之展現，倘如馮氏所稱「孔子五十既知天命，故至六十而已順天命」，則又何須「知其不可而為之」，以致「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⁴⁵哉？是以馮友蘭已犯因果錯亂之誤矣。

參、「耳順」之「耳」，更非「衍字」之謂

近人王國維（1877-1927）曾提出「二重證據」之論，其稱：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⁴⁶

王氏強調，由地下出土之新材料，得據以補正紙上之內容，並進而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且澄清各家不正確之訓釋，亦僅能顯示概屬一方之詞爾。

姑不論「二重證據法」始不始於王國維，⁴⁷其言之中肯道地，確然明示考據方法之運用。

今考中國現存尚保有「六十而耳順」之《論語集解》唐抄本，計有：

一、清·傅云龍（1840-1901）收錄於所輯《養喜廬叢書》中之唐代《論語集解》，其〈為政篇〉即完整明記：「六十而耳順」。⁴⁸

該本出處據傅云龍跋文，乃出於貴陽陳衡山之唐卷子本，且跋文說：「按是本，文與津藩本正同」⁴⁹，然「津藩本」即如傅云龍跋文所稱：「管家本所謂津藩有造館本者，是鈔於昌泰二年，當唐光化二年。」⁵⁰傅氏所云「管家本」即為

42 唐·韓愈，李翱撰：〈為政第二〉，《論語筆解》，卷上，頁4。

43 西漢·司馬遷撰：〈孔子世家第十七〉，《史記》，卷47，頁1917-1918。

44 三國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憲問第十四〉，《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14，頁227。

45 〔西漢〕司馬遷撰：〈孔子世家第十七〉（上海：中華書局，1963年），《史記》，卷47，頁1935。

46 王國維著：〈前言〉，《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3。

47 今有學者汪啟明以劉師培（1884-1919）1905年於《古政原論始論·總敘》中即主張「運用書籍、文字、器物三者互證」之說，從而否定「二重證據法」，不始於王國維。惟內容不在本文考究範圍，其結果亦不影響本文論證，故聊備數語，以茲參考。詳參汪啟明：〈「二重證據法」不始於王國維論〉，收錄《第一屆「中華經學」國際暨第三屆全國經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56-57。

48 〔三國·魏〕何晏：〈論語為政第二〉，《論語集解》，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據《養喜廬叢書》影印），第34冊，頁568。

49 同上註，頁600。

50 同上註。

「津藩有造館本」，亦即「津藩本」是也，其鈔寫年代為唐昭宗光化二年，即西元 899 年。而傅氏所得唐卷子本，其文既與津藩本同，則傳鈔年代，當不晚於津藩本。

二、清·陳渠（？）於上述唐寫本《論語集解·後序》中，言其曾見日本所存《論語》古本，且云：

……一此本《皇侃義疏》，藏于足利學校，日本根遜志校刊字伯修，平安服元喬〈序〉云：「寬延庚午」，當國朝乾隆十五年。錢氏大昕《日記》中已載。⁵¹

今查清·錢大昕（1728-1804）《日記鈔》即稱：「其書刻于《七經孟子攷文》之後也。」⁵²據此翻閱《七經孟子攷文補遺·論語序》所述：

謹按：足利學所藏《論語》寫本二通。其一通與《皇侃義疏》本同，今不復識別焉。⁵³

文中述及《皇侃義疏》本，即為陳渠所稱藏於日本足利學校之本，且該校所藏之「《論語》寫本」與該本同。而此「《論語》寫本」，即《七經孟子攷文補遺·凡例》所云之「古本者」。⁵⁴此「古本者」又據四庫館臣述曰：「案所稱『古本』為唐以前博士所傳。」⁵⁵而〈論語序〉另釋：「其與古本同者，稱：『足利本同。』」⁵⁶

今考《七經孟子攷文補遺·為政第二》謂：

「耳聞其言」耳下有「順」字。「足利本同」 「微旨」下有「也」字。⁵⁷

上文乃考證鄭玄之註。驗本所示鄭註為：「耳『順』，聞其言」，且強調此註文，與「足利本」相同；「微旨」之下多一「也」字。

51 三國魏·何晏：〈論語為政第二〉，《論語集解》，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據《纂喜廬叢書》影印），第 34 冊，頁 600。

52 清·錢大昕著，何元錫編次：〈所見古書〉，《竹汀先生日記鈔》（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8。

53 日本·山井鼎撰，物觀補遺：〈論語序·論語第一〉，《七經孟子攷文補遺》，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84·五經總義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第 190 冊，卷 176，頁 789。

54 按：「有曰：古本者，亦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周易》三通，各三本，《畧例》一通，……《論語》二通，各二本，《皇侃義疏》一通，十本。」同上註，〈凡例〉，《七經孟子攷文補遺》，頁 5。

55 同上註，〈提要〉，《七經孟子攷文補遺》，頁 2。

56 同上註，〈論語序·論語第一〉，《七經孟子攷文補遺》，頁 789。

57 同上註，〈為政第二〉，《七經孟子攷文補遺》，頁 792。

覈勘〔清〕盧文弨(1717-1795)之言得知,「足利本」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十五日前傳入中國,⁵⁸查考該本,即為陳渠所稱「藏于足利學校」之《皇侃義疏本》。⁵⁹省審其〈為政〉原文即是:「六十而耳順」,且註云:「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⁶⁰,對照上述驗本注文,兩者全然相埒,據此可知,驗本之〈為政〉原文,亦當同於「足利本」。

因「足利本同」四字,可知《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之驗本原文,與古本相同,而此「古本」即為四庫館臣所述「唐以前博士所傳」之本,且此本又同然《皇侃義疏》本,若此「六十而耳順」之「耳」,於日本足利學校所藏之「寫本」(唐以前博士所傳)、《皇侃義疏》本,咸皆存有一「耳」字焉。

三、陳渠同於上述唐寫本《論語集解·後序》,援引清·錢曾(1629-1701)之言,稱:「『正平本』,錢遵王謂筆畫如六朝初唐人書碑板,已入《古逸叢書》。」⁶¹

陳渠序中所稱「正平本」,乃錢曾所言之「高麗抄本《何晏論語集解》」⁶²,錢曾對該書評曰:

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書碑版,居然東國舊鈔,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之者,洵為書庫中奇本。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考之。⁶³

由錢氏之言以觀,其推崇之「高麗抄本」確然即為陳渠所謂之「正平本」,該書重新鏤梓時間則為「正平甲辰五月」,內容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書碑版,且陳渠稱此本已收入《古逸叢書》。

錢曾未知「正平甲辰」為朝鮮何年號,然民國·楊守敬(1839-1915)曾就此考證云:

案正平甲辰,為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當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據所云重新鏤梓,則猶有原本可知。驗其格式字體,實出於古卷軸,絕不與宋槧相涉,其文字較之《羣

58 三國魏·何晏撰,南朝梁·皇侃義疏:〈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論語集解義疏》,收入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據《知不足齋叢書》)影印),第七函,葉2。

59 同上註,葉1-2。

60 三國魏·何晏撰,南朝梁·皇侃義疏:〈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論語集解義疏》,收入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據《知不足齋叢書》)影印),第七函,卷1,葉19。

61 三國魏·何晏撰:〈論語為政第二〉,《論語集解》,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據《養喜廬叢書》)影印),第34冊,頁600。

62 清·錢曾撰:〈經·何晏論語集解十卷〉,《讀書敏求記》(清雍正四年,趙孟升松雪齋刻本),卷第1,葉16。

63 同上註,葉17。

書治要》、「唐石經」頗有異同，間有與「漢石經」、《史》、《漢》、《說文》所引合，又多與陸氏《釋文》所稱一本合，彼邦學者，皆指為六朝之遺，並非唐初諸儒定本，其語信不為誣。……唯錢遵王《述古堂》一通，因得自朝鮮，遂誤認為朝鮮刊本，蓋彼時未知正平為日本年號也。⁶⁴

楊守敬證之「正平甲辰」，實為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亦當中國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之時，足見該本重新鏤梓時間即為西元 1364 年。

楊氏更校驗該書格式字體，實出古卷軸，絕不與宋版相涉，且文字與《羣書治要》、「唐石經」頗有異同，間與「漢石經」、《史記》、《漢書》、《說文解字》所引咸合，更與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所稱之本，多所相契，是以贊同日本學者，言該書不屬唐初諸儒定本，而為六朝遺文之說。

楊氏並指錢曾因該書得自朝鮮，故於《述古堂藏書目錄》，誤載該則為「朝鮮刊本」⁶⁵，實因其時未知「正平」乃日本年號之故。

由錢曾、楊守敬二者之驗，顯然「正平本」抄寫年代，至遲不晚於初唐，當無疑異。

對照《古逸叢書》收錄之「覆正平本」《論語集解》，於〈為政篇〉所載，確然亦為：「六十而『耳』順」⁶⁶，猶然有「耳」。

四、近人羅振玉（1866-1940）藏有「敦煌本」《論語集解》殘卷，著有跋文曰：

《論語》〈學而〉末數章及〈為政篇〉凡五十行，尾題《論語》卷第二，後有題識二行曰：大中五年五月一日，學生陰惠達受持讀誦書記。貞明九年癸未歲六月一日莫高鄉。

⁶⁷

羅振玉所藏「敦煌本」《論語集解》殘卷，保有〈學而〉篇末數章及〈為政篇〉五十行，且殘卷尾題「《論語》卷第二」，後有題識「大中五年五月一日，學生陰惠達受持讀誦書記。貞明九年癸未歲六月一日莫高鄉。」

64 楊守敬撰：〈論語集解十卷日本正平刊本〉，《日本訪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930 冊，卷 2，頁 494。

65 清·錢曾撰：〈經〉，《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卷第 1，葉 3。

66 清·黎庶昌校刊：〈為政第二〉，《「覆正平本」論語集解》，收入《古逸叢書》之三（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館景刊本），卷 1，頁 10。

67 羅振玉著：〈敦煌本論語集解殘卷跋〉，《貞松老人外集》，收入《羅振玉學術文集》（上虞羅氏 1927 年鉛印本，昭和 18 年〔1943〕收藏于「帝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卷 3，葉 5。

今考其殘卷原文，確如羅氏所述，原文殘卷詳如下圖 1、2：



圖 1⁶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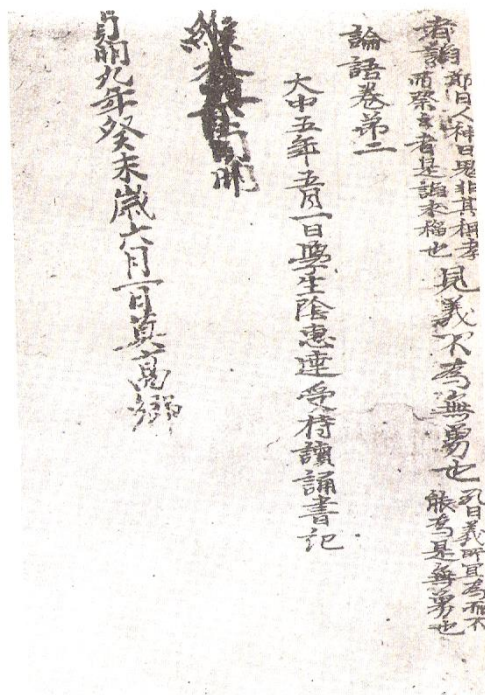


圖 2⁶⁹

68 羅振玉輯：〈論語何氏集解殘卷〉，《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70 年），頁 3157。

69 同上註，頁 3158。

由圖 1 明顯看出手抄本寫載：「六十而『耳』順」，「耳」字如前所述，依然於此呈現。圖 2 所記「大中五年」，乃唐宣宗大中辛未年時，亦即西元 851 年，顯見該殘本抄寫於唐時確然無誤。

上舉四例唐抄本《論語集解》，其〈為政篇〉「六十而耳順」之「耳」，無因抄者不同、抄寫年代各異，而有所差別，「耳順」之「耳」同然存在。

是以于省吾倡「耳字乃衍文」⁷⁰之說，無異憑空想像。且程石泉（1909-2005）據陳鐵凡（1912-1992）引英人斯坦因「敦煌《論語集解》」殘卷編號 S.4696 所載：「六十如順」⁷¹之孤證，逕采于氏「衍文」之論而稱：「是則唐人抄本《論語》原無『耳』字。」⁷²更謂：「想唐抄本不據石經而另據民間通行本」⁷³，藉此以釋「何以漢唐石經有『耳』字」⁷⁴之因，程氏所犯相類于氏，雖說充滿推理，惟欠缺實際明證。若此傳佩榮上承二者兼納韓愈「順天命」之說，則猶然方以類聚耳。

于省吾另稱「耳」之衍文，「其衍必在秦漢之際」⁷⁵，此說亦如向壁虛造，毫無佐證，難以信服。今考 1973 年出土於河北定州八角廊「漢墓竹簡《論語》殘簡」，其〈為政篇〉恰保留「……而耳順」⁷⁶之殘字。

該竹簡《論語》，自「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中出土」⁷⁷，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稱：「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論語》抄本。」⁷⁸竹簡整理小組云：「因中山懷王劉修死于漢宣帝五鳳三年（前 55 年）」⁷⁹，是以此抄本成書，當是「公元前 55 年以前的本子」。⁸⁰然「是時有《魯論》、《齊論》、《古文論語》三種《論語》存在。」⁸¹

又據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考證云：

在簡本中發現《魯論》所具有的文字，則應當是《魯論》本來的東西。這是從今本《論語》中看不到的。在定州漢墓竹簡中和《論語》一起出土的，還有蕭望之的奏議。蕭望之在當時是皇太子的老師，是傳授《魯論》的大師。劉修死後，把《論語》同蕭望之的奏議放在一起，應不是偶然的。⁸²

70 于省吾撰：《論語新證》，收入嚴靈峯編輯：《無求備齋論語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年據排印本影印），第 26 函，255 冊，頁 2。

71 陳鐵凡：〈敦煌《論語》異文彙考〉，收入中華民國孔孟學會編輯：《孔孟學報》（臺北：中華民國孔孟學會，1961 年），第 1 期，頁 101。

72 程石泉著：《論語讀訓解故》（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組，1981 年），頁 14。

73 同上註，頁 14。

74 同上註。

75 于省吾撰：《論語新證》，第 26 函，255 冊，頁 2。

7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頁 11。

77 同上註，〈前言〉，《定州漢墓竹簡《論語》》，頁 1。

7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論語》介紹〉，《文物》1997 年第 5 期，頁 59。

79 同上註。

80 同上註。

81 同上註，頁 59。

82 同上註，頁 61。

整理小組依簡本文字及西漢·蕭望之(?)之奏議推論,該簡本《論語》乃「魯論」無疑。

《隋書·經籍志》有言:

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⁸³

〈經籍志〉稱西漢·張禹(?)刪《齊論》之〈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合《魯論》、《齊論》而成《張侯論》。另有《古論語》出,其章句與《魯論》等同,僅別《魯論》於「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⁸⁴東漢·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校《齊論》、《古論》而以作注。

校考《漢書·張禹列傳》云:

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⁸⁵

「初元」乃漢元帝年號,「初元中」則於初元二至三年間,亦在西元前 47 至 46 年。其時張禹受詔以授太子《論語》,乃於中山懷王劉修歿世(西元前 55 年)之後;且元帝崩,成帝即位,封張禹為安昌侯,亦在「河平」四年,即西元前 25 年之時。故可推論,其合併《齊論》、《魯論》當於授成帝《論語》之際,⁸⁶惟《張侯論》乃其封侯後之世稱。

是以單承彬即稱:「宣帝五鳳年間正是三種《論語》傳本并存的時候,而且安昌侯張禹的《張侯論》尚未形成。」⁸⁷且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亦謂:「東漢末年的『熹平石經』,以及今天所流傳的《論語》,基本上就是《張侯論》。」⁸⁸

83 唐·魏徵等撰:〈志第二十七,經籍一〉,《隋書》,收入《二十四史》(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光緒癸卯冬十月,五州同文局據武英殿版石印),卷 32,葉 31。

84 三國魏·何晏撰,南朝梁·皇侃疏:〈敘〉,《論語集解義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89·四書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95 冊,頁 338。

85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漢書》(上海:中華書局,1964 年),卷 81,頁 3348。

86 按:「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同上註,頁 3352。

87 單承彬:〈定州漢墓竹簡本《論語》性質考辨〉,《孔子研究》,2002 年第 2 期。

8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頁 1。

是以單承彬即稱：「宣帝五鳳年間正是三種《論語》傳本并存的時候，而且安昌侯張禹的《張侯論》尚未形成。」⁸⁹且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亦謂：「東漢末年的「熹平石經」，以及今天所流傳的《論語》，基本上就是《張侯論》。」⁹⁰

若此可知，出土之定州簡《魯論》其成書，確然早於《張侯論》，而《張侯論》原即張禹：「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之當今通行本作品；對比出土之《魯論·為政篇》殘文：「……而耳順」，咸信該殘文之完整詞句，必同然於《張侯論》，即今本《論語》之「六十而耳順」原文，否則，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校《齊論》、《古論》，為「六十而耳順」作註，豈能註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況《古論語》章句與《魯論》相等，雖〈堯曰〉分有二章，惟不影響〈為政〉內容；且《張侯論》乃以《魯論》篇章為本，刪削《齊論》〈問王〉、〈知道〉二篇而合成，亦與《齊論·為政》無涉，故可推斷《古論》、《齊論》，該章之句亦必為「六十而耳順」無疑。

定州竹簡《魯論》之出土，間接證明《齊論》、《古論》、《張侯論》於〈為政篇〉「六十而耳順」之一致，而于省吾信口無憑所稱「『耳』字乃衍文」、「其衍必在秦漢之際」，則反以證實「六十而耳順」乃自秦漢之時，即已源遠流長。

肆、「耳順」之「耳」，絕非「聃」字之論

另有學者周克庸，循韓愈思維模式，惟不採韓氏：「『耳』即為『爾』說」，其另闢蹊徑，摭《莊子·天下》所謂：「以聃合驩，以調海內」⁹¹之「聃」字以代「耳順」之「耳」，其言：

「耳順」當為「聃順」。耳、聃音同（日母雙聲之部疊韻），「耳」是借字或誤字，其正字為「聃」。⁹²

周氏稱：「『耳』是借字或誤字，其正字為『聃』」。其說全然欠缺文獻佐證，亦僅一方標新之詞。

今考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引之《經傳釋詞》，咸無「聃」字訓說。僅唐·陸德明於《莊子音義》有云：

89 單承彬：〈定州漢墓竹簡本《論語》性質考辨〉，《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

9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頁1。

91 西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莊子》，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子部·第30冊·墨家類、道家類》（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總第275冊，卷10，頁483。

92 周克庸：〈孔子「六十而耳順」新解〉，《晉陽學刊》，2001年第3期，頁102。

「聃」，崔音「而」，郭音「鉅」；司馬云「色厚貌」，崔、郭、王云「和」也。聃和萬物，物各則歡矣。一云「調」也。⁹³

陸德明訓「聃」之音為「而」或「鉅」，一為陽平，一為去聲⁹⁴，且義訓為「和」亦為「調」。合二者之意即如「調和」之調。

若此，周克庸即藉「和」字轉引《說文》曰：「『和』訓『相應』、訓『合』」⁹⁵且引《禮記·郊特牲》「陰陽和」之疏：「和猶合也」及〈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⁹⁶而定義「『耳順』之「耳」是動詞，義為『應和』，與耳朵毫無關涉。」⁹⁷周氏直接否定「六十而耳順」之「耳」非「口耳」之「耳」⁹⁸，另引申為動詞「應和」之義。

周氏轉「耳」為「聃」，以「聃」訓「應和」，目的僅為求「耳順」之合理解釋，是以又將「順」另作一番說明，以符「聃順」上下字詞文義，其曰：

「順」本義為紋理，後引申出循順、服從等義，用作動詞，後又引申出「以善和人」、「慈惠和民」、「慈和遍服」、「以敬事長」、「從命而利君」（分見《荀子·修身》、《獨斷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孝經》、《荀子·臣道》）等抽象詞義，可當作名詞使用（如《詩經·大雅·皇矣》：克順克比）。「耳順」之「順」⁹⁹，即用來表抽象義的名詞，特指符合於禮的人格境界，即「仁」的境界。¹⁰⁰

周克庸以為「耳順」之「順」，乃由動詞「循順」、「服從」等義，引申出「以善和人」、「慈惠和民」、「慈和遍服」、「以敬事長」、「從命而利君」等各類抽象詞義，且此動詞又能作為名詞使用，而成抽象義之「名詞」，例如符合於禮之人格，即「仁」之境界，亦即「順」之涵義。周氏循此觀念，則更進一步強調：

這樣解釋，不僅「耳順」句不存在語法問題，不僅該章語感之連貫和遣詞造句結構形式的齊整可得到顯示，而且更與該章旨要乃至整個《論語》的思想體系相符。在該章中，

93 西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莊子》，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子部·第30冊·墨家類、道家類》（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總第275冊，卷10，頁483。

94 按《玉篇》云：如志切；鉤也。南朝梁·顧野王撰：〈金部第二百六十九〉，《玉篇》，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經部第79冊·小學類》（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總第80冊，卷18，頁556。

95 周克庸：〈孔子「六十而耳順」新解〉，《晉陽學刊》，2001年第3期，頁102。

96 同上註。

97 同上註。

98 《說文》曰：「耳，主聽者也。」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第十二篇上·文六十七·重六〉，《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597。

99 按：原文為「『耳順』之『耳』」，依上下文意，當為耳順之「順」，作者誤植為「耳」，於此逕予更正。

100 周克庸：〈孔子「六十而耳順」新解〉，頁102-103。

孔子以年齡為緯，以修身所達到的人格境界為經，句句遞進，一氣呵成地揭示了自己一步步成為仁人（「仁」等于與「禮」同構的人格）的進德之序。¹⁰¹

周氏認為，倘照其對「耳」及「順」之解釋，予以說明「耳順」之語，不但不會形成語法之問題，且能使〈為政〉「五十有五……」章之語句獲得連貫，並使遣詞造句、結構形式之整齊得以顯示。更令該章要旨，能契合整本《論語》之思想體系。

若此周氏即言：

「六十而耳順」，是說孔子時時事事處處無不與禮相應相和，不僅所思所想所言所行無違於仁而且能更進一步以此為安、以此為樂（〈里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仁者安仁」；〈述而〉：「依於仁」又：「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¹⁰²

周克庸稱孔子「六十而耳順」，已達時時、事事、處處無不與禮相應、相和，不僅所思、所想、所言、所行，無違於仁，且能更進一步以合於禮為安、以合於禮為樂；並舉〈里仁〉篇：「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仁者安仁」及〈述而〉篇：「依於仁」、「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等諸章言以佐其論。

倘若周氏之理成立，不禁令人疑惑！孔子一生樂於行仁，凡事合禮，仁禮相和，又豈至六十方能如此？昔日齊景公問政孔子，時年三十五之孔子即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曰：「政在節財。」¹⁰³孔子回答，不但看出其禮學之修為，且懂「仁政」之胸懷；為此晏嬰（578-500B.C.）進諫景公，曰：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104

晏嬰推崇孔子，其禮節之繁縟，朝拜晉謁之節奏、規則，服儀打扮、進退得體，皆合乎禮，累積幾代都無法盡得其學，又如何一年而能探究其禮。由晏氏之語，更加看出年僅三十五之孔子，不待六十，即早已熟稔禮法。舉上之例，已明顯推翻周氏釋「六十而耳順」之說。

周克庸以「無違於仁合於禮」作為「耳順」之解，恐犯同類於于省吾因誤識「耳」字之義，而斥鄭玄：「孔子豈待六十聞言，始知其微旨乎」¹⁰⁵之語，若此，

101 周克庸：〈孔子「六十而耳順」新解〉，《晉陽學刊》，2001年第3期，頁103。

102 同上註。

103 西漢·司馬遷撰：〈孔子世家第十七〉，《史記》（上海：中華書局，1963年），卷47，頁1911。

104 同上註。

105 于省吾撰：《論語新證》，收入嚴靈峯編輯：《無求備齋論語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周氏豈非猶如于氏之譏曰：「孔子豈待六十方無違於仁乎？方能以此為安，以此為樂哉？」其無理之處，實乃不言而喻。

《論語·為政》：「六十而耳順」之「耳」，於上分析，確然存在。此「耳」必為「口耳」之「耳」，猶如鄭玄所稱：「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之「耳」，絕非「聃」字所能取代。

伍、結語

孔子其於《論語》首篇〈學而〉第十六章云：「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¹⁰⁶該言即在強調君子首重「知人」之道。故孔子又於〈衛靈公〉第七章稱之：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¹⁰⁷

孔子謂，欲得賢能之才，可由言語交談獲致。惟可與之言者，必先聽其言，觀其行後方以定之。倘可與之言卻未言者，則將失去該等人才；然聞其言，觀其行，因言不得中，本不可與之言，卻受其惑亂而與之，則言者必將失言。

若此孔子訓戒有智慧者，必能掌握可語不語，能言不言之訣竅，故而將不觸失人之疏亦不犯失言之過。

言與不言首在於「耳聞」之判斷。觀其行時，易受外在虛偽之蒙蔽，然由「耳聞」修為，終能了然其真相，進而養成「知人」之功夫。是以孔子又於《論語》末篇〈堯曰〉之末章，再次申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¹⁰⁸

孔子言欲為君子首須「知天命」；欲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者，則須「知禮」；欲能「知人」者，必先「知言」也。

「知言」之功夫，即在「耳順」之培養，「耳順」之關鍵，則在於「聽」者之修為。其乃孔子洎「知天命」後迄六十歲時方臻之境界，故言：「六十而耳順」。

惟「聽」之哲學，乃至「耳順」之修養，確然位處達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樞紐要衝。是以《文子·道德》亦言：「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¹⁰⁹，倘未能「耳聽」之於「耳順」，則無可獲致「從心所欲不踰矩」

年據排印本影印)，第26函，255冊，頁2。

106 三國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學而第一〉，《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第1，頁14。

107 三國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衛靈公第十五〉，《論語注疏》，卷第15，頁238。

108 三國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堯曰第二十〉，《論語注疏》，卷第20，頁308。

109 東周·辛釐撰：〈道德〉，《文子》，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子部第31冊·道家類》

之「上學神聽」之殊勝意境。「耳順」之「耳」即「聽聞」之意。然「聽」者，亦最為人所不易修養掌控，甚難及其精微，即如朱熹所云：

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¹¹⁰

朱子言「聽」，最為人所輕忽、疏略。如何養成所聞皆是道理且無一例外，才是「聽」字，真正蘊涵之至理大義。

故朱熹又稱：「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¹¹¹若此「入耳」無不順，則「六十而耳順」之「耳」即與「聽聞」相繫，此「耳」者，誠然「耳朵」無異，非語助「而已」之詞。

再者，由現存及出土文獻材料，業已證實「六十而耳順」之「耳」，至遲於西漢之初，三《論》並存之時，已然具在，絕非傳鈔之「衍字」，其義亦非與「爾」相通，更與「聃」字不相干涉，此論可謂鐵證如山，無可撼動矣。

（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總第276冊，卷上，頁122。

110 南宋·黎靖德編：〈論語五·為政篇上·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朱子語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6·儒家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700冊，卷23，頁472。

111 同上註，頁477。

參考文獻

一、古籍

- 東周・辛釗撰：《文子》，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子部第 31 冊・道家類》總第 276 冊（臺北：世界書局，1988 年）。
-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上海：中華書局，1963 年）。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上海：中華書局，1964 年）。
- 東漢・許慎撰，北宋・徐鉉增釋：《說文解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217・小學類》第 22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
- 東漢・趙岐注，北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 三國魏・何晏集解，唐・陸德明音義，北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經部第 69 冊・論語類》總第 70 冊（臺北：世界書局，1988 年）。
- 三國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89・四書類》第 1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三國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 三國魏・何晏等集解，明・葛鼎校訂：《論語》（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 年據永懷堂本校刊）。
- 三國魏・何晏撰：《論語集解》，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據《纂喜廬叢書》影印）。
- 三國魏・何晏撰，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收入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年據《知不足齋叢書》）影印）。
- 西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莊子》，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子部・第 30 冊・墨家類、道家類》總第 275 冊（臺北：世界書局，1988 年）。
- 唐・太宗文皇帝撰：《晉書》（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光緒癸卯冬十月，五洲同文局據武英殿版石印）。
- 南朝梁・顧野王撰：《玉篇》，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經部第 79 冊・小學類》總第 80 冊（臺北：世界書局，1988 年）。
- 唐・魏徵等撰：《隋書》，收入《二十四史》（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光緒癸卯冬十月，五洲同文局據武英殿版石印）。
- 唐・韓愈，李翱撰：《論語筆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90・四書類》第 19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唐·韓愈撰，〔日〕伊東龜年校正：《論語筆解考》，收入嚴靈峯編輯：《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第 27 函，264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年據日本明和八年嵩山房刊本影印）。
- 南宋·朱熹撰：《論語集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91·四書類》第 1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6·儒家類》第 70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 清·顧炎武撰：《亭林文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
- 清·錢曾撰：《讀書敏求記》（清雍正四年，趙孟升松雪齋刻本）。
- 清·錢曾撰：《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
- 清·錢大昕撰，何元錫編次：《竹汀先生日記鈔》（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清·王引之撰，民·黃侃、楊樹達批本：《經傳釋詞》（長沙：岳麓書社，1982 年）。
- 清·黎庶昌校刊：《「覆正平本」論語集解》，收入《古逸叢書》之三（清光緒十年，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館景刊本）。
- 〔日〕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84·五經總義類》第 19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二、近人編輯、論著

- 楊守敬撰：《日本訪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第 9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于省吾著：《論語新證》，收入嚴靈峯編輯：《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第 26 函，255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年據排印本影印）。
- 王國維著：《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年）。
- 汪啟明：〈「二重證據法」不始於王國維論〉，《第一屆「中華經學」國際暨第三屆全國經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1-88。
- 周克庸：〈孔子「六十而耳順」新解〉，《晉陽學刊》，2001 年第 3 期，頁 102-103。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論語》介紹〉，《文物》1997 年第 5 期，頁 59-61。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著：《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
- 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 年）。
- 陳鐵凡：〈敦煌《論語》異文彙考〉，《孔孟學報》（臺北：中華民國孔孟學會，1961 年），第 1 期，頁 87-247。

- 陸信禮：〈孔子自述章淺解之六十耳順〉，《中國海洋大學校報》（電子版），第 1748 期（2012 年 4 月 12 日），第 3 版：觀點。（網址：http://ouceducnxaoba.o.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595664）
- 傅佩榮著：《儒家哲學新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 年）。
- 單承彬：〈定州漢墓竹簡本《論語》性質考辨〉，《孔子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29-38。
- 程石泉著：《論語讀訓解故》（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組，1981 年）。
- 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馮友蘭著：《新原道》（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年）。
- 錢穆著：《論語新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
- 羅振玉著：《貞松老人外集》，收入《羅振玉學術文集》（上虞羅氏 1927 年鉛印本，昭和 18 年〔1943〕收藏于「帝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
- 羅振玉輯：《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70 年）。

投稿日期：2016/09/19 接受日期：2016/12/13

A Ver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Er” in the Collocation of “Er-shun” as a Meaningful Element, Not an Expletive

Hsiu-Ren Lu¹

Abstract

At the period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there were 3 versions of the canon “Confucian Analects.” In the chapter “Government Exercises”, Zheng Xuan had made an annotation of the phrase “At sixty, my ear was an obedient organ for the reception of truth” as “knowing the truth right at the moment hearing it.” He-Yan’s “The Analects Explain” and Wong Kan’s “A Review about the research on editions of The Analects Explain” (488-545) all accepted his explan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Han-Yu (768-824) had explained that the word “ear” (「耳」) did not refer to the organ. Instead, it is a homonym for the phrase “nothing more” (「爾」). Li-Ao (774-836) accepted such explanation. Afterward, there was also such explanation that the word was just a pleonasm with no actual meaning. Such diversion from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word has disturbe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or years. However, referring to the copy from the Tang Dynasty, we can determine that the word actually refers to the organ and it does not represent the meaning “nothing more.” In addition, it is definitely not a pleonasm with no meaning.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clarify such ambiguity that has disturbe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or years, and confirm the definition of the word.

Keywords: government exercises, obedient ear (Er-shun), Confucian Analects, Confucian classics

¹ Lecturer,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Hsiu-Ren Lu, E-mail: E-mail: ts168tw@gmail.com